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美国无视历史事实,置国际条约、法规于不顾,驻兵台湾海峡,践踏中国主权,威胁新中国的安全,且给中国统一制造障碍。美国这样做的意图不单单是支持国民党当局,不承认新中国,其实质是反共,这是服务于其反对共产主义并称霸全球的战略的。所以,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动静,与新中国作对,毛泽东就会反美,决不含糊也决不示软。

美国介入金门炮战,使我解放“金马”计划又一次落空,这是我国用武力解放台湾的最后一次尝试。台湾问题无法解决,美国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便依然存在。美国介入金门炮战,说明美国的反华政策暂不会改变。对此,毛泽东强压怒火,期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寄予希望。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院会议上说:“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1](javascript:void(0);)]在王炳南返回华沙前,毛泽东特别接见了他,指示不要用过分刺激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要多用劝说的方法等,意在求得美国的让步。可是9月15日会谈开始后,美国拒不让步拒不完全撤军,坚持一贯的侵占台湾的政策,终于1964年,会谈均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既然美国强烈反华,继续干涉中国内政,践踏中国主权,出于民族感情考虑,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除了针锋相对,猛烈反击外,别无选择。

但到了六十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苏关系破裂，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长期消耗在与苏联的争霸中已处于守势，而中国接连试爆原子弹、氢弹成功，渐渐展现出作为大国的实力。

美国方面，新上台的尼克松总统研究了国际形势，决定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时又受到苏联、美国两方面威胁，外交工作陷入混乱。好在毛泽东及时察觉到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并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苏联和美国发动反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且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同时领导集团做出判断，美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也需要拉拢中国来对抗苏联，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有可能也有必要。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些判断的正确性。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中美双方相互释放善意，进行了一些会谈，一次意外的“乒乓外交”更是加速了中美建立正常关系的进程。之后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签署了《联合公报》，又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后在1979年正式建交。

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成功，关键在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的正确判断，没有一味地固守反对美帝的思想，而是实事求是，从实际的国际形势出发，敏锐地捕捉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对外的方针政策。同时在会谈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关键问题如台湾问题时，中国始终不让步，坚守底线原则，捍卫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体现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

参考文献：向东洋：《调试与稳定——论1972到1982年的中美关系》，中共党校博士论文，2021年。

参考文献2：

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历史逻辑

姜安

**积极谋求主权独立**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重，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近代以来的国际经验和历史教训，迫切要求新中国的政治家除了具有现代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外，还需要具备对国际事务的卓越理解力，站在时代高度，考量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思考中国的历史方位，谋划出纵横捭阖的外交战略，维护国家安全与独立。这成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站在“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提出了自己的独立外交思想。这就是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文献中显示的外交逻辑：中国曾经遭受了帝国主义一个多世纪的侵略，新中国必须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殖民压迫，构成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政治基础。

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近代国际体系中，西方列强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主权之争，实际上是欧洲中心主义与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斗争，落后国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建立现代主权国家。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中，以主权平等和自主为核心外交目的，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剥削和压迫，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历史价值观和历史使命诉求。

**坚持新中国外交自主**

抗日战争是毛泽东自主外交思想的实践前提，他一以贯之的自主外交思想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思考形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毛泽东在思考中华民族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时，形成强烈的民族自主崛起意志。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这种外交意志逐渐演化为突出的外交独立印记，加强了中国在世界体系的主体地位和自我意识。

“冷战”的爆发使得中国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作为对国际局势新变化的回应，毛泽东的“一个中间地带”思想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对“冷战”形势的判断，成为毛泽东决心走向自主外交的重要国际动因。

朝鲜战争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的战略思想和政治意志。这表现为：一、就战争性质而言，在他看来，中国已经获得了正义性的支持。这坚定了他关于新中国必须要独立自主地参与战争的决心和意志。二、苏联的犹豫和游离，使他对苏联的政策产生疑虑和怀疑，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必须实行自主外交的决心。三、他将朝鲜战争定位为帝国主义霸权势力与民族解放力量之间的斗争，中国的参战是走向独立外交的政治保证。

**强调以国家安全为主体**

毛泽东的文化价值观主要体现为历史文化观和革命意识形态，这是影响其外交思想的重要因素。就前者而言，既基于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发展逻辑，来源于落后民族国家受压迫的历史经历，同时也来自对国际旧秩序的质疑。这种历史经验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呐喊，成为毛泽东坚决走向独立外交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就后者而论，革命意识形态对毛泽东将国际社会划分为敌、我、友产生极大影响。在一段时期内，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密切联系。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外交观，成为独立自主外交的思想支柱。就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毛泽东指明了中国外交文化的方向，即民族解放与独立自强。在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这种民族主义的诉求既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文化符号，也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思想主轴。

毛泽东的国际伦理主义观为中国外交思想大厦进行了顶层设计。“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外交的两个首要目标。毛泽东的外交价值维度非常重视诉诸国际伦理的理解和阐释，即在基本价值层面上，强调对主权、人权、正义、自由、安全的尊重；在民族国家道义上，突出民族独立、平等、自决和人民解放的理念。毛泽东秉承的道德标准是国际公正与平等、民主与人权、自由与独立，从而界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成为历届中国政府外交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之一。